

青年志愿服务参与对共同富裕知晓度、 关联度的影响分析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

邹宇春 杨欲饶 刘扬

[摘要]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已成为新时代的中心议题，青年群体则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生力军。本研究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聚焦青年群体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与志愿服务参与度，将青年群体划分为“90后”和“00后”两个代际群体，通过CSS2023数据分析发现：一方面，“00后”与“90后”相比具有更高的共同富裕知晓度与关联度；另一方面，“00后”的志愿服务参与度较高，与“90后”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研究还发现，志愿服务参与度是影响青年群体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代际差异对志愿服务参与度与共同富裕关联度的关系发挥了调节作用。

[关键词] 青年群体；共同富裕；志愿服务；代际差异

[作者简介] 邹宇春，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欲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强调发展的人民性、正义性、公平性、共享性，其核心价值是社会的公平正义^[1]。伴随着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愈加凸显，对共同富裕的制度构建和政策研究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建设中越来越重要。根据政策认同形成机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远景目标首先要使社会群体在心理上对该政策形成认同，进而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积极的态度和配合的行为。从政策认同的演化轨迹上看，社会群体对国家政策的理性认知是政策认同的前提和基础^[2]。因此，研究共同富裕政策认知是政策认同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推进社会群体对共同富裕政策行为遵从的必由之路。

“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党的二十大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视野对新时代青年群体寄予了殷切希望。青年群体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是推动社会创新和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也是当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目标实现的重要对象。当代青年享受着共同富裕政策带来的红利在成长，作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应当将共同富裕的理念植根内心，将共享理念付诸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建设实践中。青年群体对于共同富裕政策的认识，决定了他们进行共同富裕实践的具体行为和持久意志。同时相关研究表明，当代中国青年因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的不断提升，普遍具有更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愿和行为。因此，让共同富裕的理念与理想扎根于青年一代的头脑中，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

志愿服务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方式，对于促进公平正义、聚合社会资本、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共治共享水平，进而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3]。同时，志愿服务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节点上，志愿服务因其公益性、自愿性和无偿性等特征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释放出越来越大的能量。作为当代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参与面最广、社会程度最高的社会实践公益活动，志愿服务是他们紧密联系社会、内化思想政治教育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4]。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历史时刻，促进青年全面认识共同富裕政策，把握好志愿服务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对这一宏伟事业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青年是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新时代青年群体成长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形成了独特的集体特征。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变迁，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和发展取向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代际差异问题逐渐凸显，引起社会关注^[5]。目前有许多研究基于代际视角探讨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但聚焦于志愿服务与共同富裕政策认知的关系存在何种代际差异的研究较少。综上，本文采用202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关注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与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的关系，重点回答以下问题：（1）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在青年群体中是否存在代际差异？（2）志愿服务参与度在青年群体中是否存在代际差异？（3）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度如何影响其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这种影响是否存在代际差异？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共同富裕与青年群体

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统一，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从理论视角来看，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和最高形态，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6]。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引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凝结的科学的指导思想里都包含了共同富裕的思想理念。从实践角度看，历史实践表明，如果脱离了人民性这条主线，中国式现代化就偏离了正确方向、失去了力量之源^[7]。正因我们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中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人民性原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才得以在此基础上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在于各自具有不同的奋斗目标^[8]。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将共同富裕的理念纳入制度设计的顶层框架之中，在关乎民生领域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充分展现出来^[9]，这与资本控制下的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资本无限扩张和巨大贫富差距形成鲜明对比。综上，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引，为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战略支撑。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已成为当前我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议程。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一项需要全国民众高度投入的全国范围的事业。政策接受模型认为，民众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取决于他们对政策内容的理解、对政策目标的认同以及对政策执行者的信任。因此，通过增强民众对全国性事业或政策的知晓度和认同感，可以提高他们对政策的接受程度，进而促进他们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从经济学角度看，“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当个体认为自己是某件事情的利益相关者时，他们会更有责任感参与其中，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利益或其他形式的回报。与某件事情的关联度越高，个体对其给予的关注和投入也就越高。换言之，

我国正在推进的共同富裕事业，并不是历史上的“均贫富”，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需要人人参与之，人人奋斗之，人人享有之。这意味着，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广大民众在高度知晓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将其当成切身相关的事业来对待，如此方能有效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也就是说，民众有关共同富裕的知晓度、关联度越高，越有责任感参与其中并为之奋斗。从政策沟通理论来看，如果发现缺乏足够的知晓度或关联度，应通过媒体、网络等渠道向民众普及政策内容、意义和目的，增强民众对政策的了解和认同，将有助于政策的顺利实施。

中国青年是社会建设的生力军，青年群体的发展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之中，与中国式现代化逐渐形成了一种同向互塑、良性互促的发展图式^[10]。针对青年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有研究认为我国青年具有相对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强烈的民族精神，这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青年群体在科技创新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物质基础^[11]。由此可以看出，青年群体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认知行为理论，个体的认知与行为互相作用，认知的形成与发展对相应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个体的政策认知很大程度会影响个体的政策参与和行为决策。国内学者在对青年群体政策认知与行为选择的关系研究中指出，青年群体的政策认知对其实际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在政策参与认知与实际参与行为的关系中，政策参与态度则发挥着调节作用^[12]。已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青年群体的政治素养和认知水平不高，导致其政治参与水平低下，在现实参与过程中存在参与认知与行为相互脱节的现象^[13]。国外也有相关研究表明，对于政策的认知能力是青年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重要预测变量，政策认知度对政治参与行为产生正向促进作用^[14]。

根据已有研究的发现，本研究认为，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中，青年群体积极作用的发挥将会受到青年群体对共同富裕政策认知的影响，研究青年群体共同富裕认知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遗憾的是，基于政策认知角度探讨青年群体的共同富裕认知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还比较欠缺。由于政策的自觉性意识会深刻影响共同富裕的主观世界的正向性走向^[15]，因此需要了解并有针对性地积极培育青年群体对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自觉性意识，并引导他们积极投身其中，增强主体参与共同富裕进程的意识。基于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基于最新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聚焦于共同富裕知晓度和与自身生活关联度两个主观指标，探究青年群体共同富裕政策认知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而探寻提升两者的可行之策。

（二）青年群体的代际差异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社会代”的概念，强调同龄人群体因为深受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形成了极强的代际认同与鲜明的代际特征，从而与其他世代在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社会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16]。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以十年一代为代际划分标准，各代都经历了身处时代的变迁，他们的人生经历、成长环境、社会生产条件等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青年群体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成长于快速而剧烈的经济社会变迁和信息技术变革周期极速缩短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出明显有别于其他代际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17]，这种特征是个体生命历程发展与社会发展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代际社会学的发展，许多国内学者采用这一学说来解释当代青年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及其社会影响。李春玲指出，从社会变迁与代际比较出发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把握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的总体特征及变化趋势^[18]。陆杰华、郭荣荣认为需要在代际社会学视角下进行代际比较和代内差异分析，以此使代际观念和行为差异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并引导青年顺利完成社会化^[19]。因此，基于代际视角研究青年群体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对于实现青年发展目标、推动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青年群体代际差异的现有研究发现，当代青年已经实现了完整的代际转换，“70后”

已经退出了当代青年舞台，“80后”处在青年群体与中年群体的过渡地带，“90后”成为青年舞台上的主体和活跃力量，“00后”正在阔步走向历史前台^[20]。在价值观念层面，魏莉莉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维度对“90后”和“80后”的价值观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青年群体在价值观上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90后”比“80后”具有更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21]。而“00后”的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他们不再把自己的个人价值追求和目标放在某个固定单一的目标上，而是结合时代背景、社会需求、自身能力等多个方面来规划个人未来的发展路线^[22]。在政治态度层面，有研究表明，青年群体具有较强的文化自信、国力自信和制度自信，越年轻的青年群体对国家实力的评价越高，“00后”对于我国综合实力和政府执政能力的评价是最高的^[23]。也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社会宽容度以及社会政治事务参与度与代际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小的代际群体对政治事务的态度更积极^[24]。在社会参与层面，受到互联网不断普及以及教育水平提高的影响，新生代青年的社会参与意愿明显高于前辈群体。刘宏森在研究中表明，“90后”对于社会公益活动和志愿者活动的参与度较前辈群体提升较大；“90后”和“00后”对于文化类社会组织或非正式组织的参与撑起了半壁江山^[25]。

综合来看，这些研究表明了“90后”逐步取代“80后”成为青年舞台中的活跃力量，同时“00后”也紧跟其后迈入新生代大潮。新时代青年群体在价值观念、政治态度和社会参与等方面存在显著代际差异，越年轻的代际群体具有更强的政治参与意愿，越关注国家政策动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高的政策敏感度，由此推测，越年轻的代际群体，政策认知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并结合本文研究问题，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与“90后”相比，“00后”的共同富裕知晓度更高。

假设2：与“90后”相比，“00后”的共同富裕关联度更高。

（三）志愿服务对青年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的影响分析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当前国内研究者基于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界定，基本构建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不仅需要物质精神层面的双向富裕，而且需要差别合理的公平富裕。为稳步推进共同富裕，中央财经委员会明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6]，基于道德原则，通过慈善捐赠、志愿服务、公益文化等“社会之手”的第三次分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以青年群体为主力军的志愿服务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青年志愿服务呈现主流化、社会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27]，作为社会的“润滑剂”，既可助力物质精神层面的双向富裕，也可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方式之一^[28]。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谭建光、王名、谭竹希等多位研究者均论述了青年志愿服务对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被列为2035年远景目标，青年群体能否知晓共同富裕政策，是否意识到共同富裕政策与自身具有较强关联，都将关系到远景目标的实现速度与质量。为此，研究何种因素影响青年群体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具有重要意义。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属于认知维度，而认知理论认为个体与外在环境的交互作用、实现平衡是影响认识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29]。志愿服务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这一实践活动理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

已有研究发现，在内涵层面，志愿精神与公民精神高度一致；在实践层面，志愿服务实践是提升公民精神的重要途径^[30]。所谓公民精神亦可称为公民意识、公民德性或公共精神，就是公民经由对公共事务的自由参与而表现出来的对社会公益关爱与负责的精神品质。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是公民精神的基础，参与意识和参与行动是公民精神的集中表现，借此所表现出公共责任意识与乐善好施的博爱精神则是公民精神的核心^[31]。基于公民精神的内涵可以发现，具有

较高的国家政策认知是公民精神的一种体现。有学者指出,通过志愿服务可以引导青年增强集体主义和公共意识,促进其社会和谐共处观念的发展与能力的提升^[32]。也有学者指出,在提供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个体逐渐超越个人利益,并把与志愿服务的内涵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公民意识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去坚守,从而合理确定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社会责任^[33]。由此可以发现,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有助于增强其公民精神,国家政策认知又是公民精神的体现,所以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也将影响其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将对特定人群的价值观与行为产生影响^[34]。已有研究发现,在志愿服务领域,“90后”群体与“90世代”之前的群体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有学者指出,青年志愿服务参加比例随代际后移而增加,1996—2001年出生年龄组青年的志愿服务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代际青年^[35]。也有学者指出,“90后”青年的整体志愿服务参与意愿同样较高,与“90世代”前的群体存在显著差异^[36]。有学者同样指出,相较于非“90后”群体而言,“90后”更加偏重于能够凸显人生价值的领域,突出表现在环境保护、体育运动、社会志愿服务等公共社会服务领域^[37]。

由上可见,志愿服务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由认知行为理论可知,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理应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不过,已有研究主要讨论了志愿服务对培育公民精神的积极作用,并未具体论述志愿服务会对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产生何种影响。同时已有研究表明,志愿服务参与度在“90世代”与“90前世代”间存在显著差异。不过,“00后”与“90后”在志愿服务参与中是否存在代际差异,尚有待深入研究。为此,基于已有研究发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志愿服务参与度在“00后”与“90后”之间存在代际差异。

假设4: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其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为深入研究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其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的影响,本研究引入代际视角,以此分析代际差异对志愿服务参与度与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关系的调节效用。对青年群体来说,已有研究发现“80后”“90后”“00后”在诸多领域都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38]。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能够促进其爱国主义思想水平的提高,并且青年代际在志愿服务与爱国主义思想水平的关系中发挥着调节作用^[39]。此类有关青年群体代际差异及代际差异调节作用的研究,为更深入地了解青年群体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本研究中假设1、假设2以及假设3的提出是为了检验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以及志愿服务参与度在青年群体中是否存在代际差异,假设4的提出则是为了检验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对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希望进一步探究在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对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的影响中是否存在代际调节作用。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共同富裕知晓度的影响力在青年群体“90后”“00后”之间存在代际差异。

假设6: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共同富裕关联度的影响力在青年群体“90后”“00后”之间存在代际差异。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2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第九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2023)。该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采用多阶段混合概率抽样方式,使用CAPI系统完成入户访问,调查对象为18—69岁的中国公民,最终有效样本数为13048。CSS2023采用随机分卷模式,“共同富裕”模块随机分布在B卷,该模块的样本量为调查规模的一半。本研究采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标准,14—35周岁人口为青年群体,结合CSS2023调查对象的年龄特点,最终确定分析对象为18—35周岁,共有3254份有效数据。本研究使用STATA17软件进行分析。

(二)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研究把共同富裕政策的知晓度和关联度作为因变量,代表研究对象共同富裕政策的认知情况。在问卷中采用“您是否知道政府的‘共同富裕’政策?”一题测量共同富裕知晓度,该变量为二分类变量,0代表“不知道”,1代表“知道”;采用“您觉得‘共同富裕’政策和您的生活是否有关联?”一题测量共同富裕关联度,该变量为定序变量,将“不相关”“不太相关”“比较相关”“非常相关”的回答分别赋值1至4。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以志愿服务参与度为解释变量。在问卷中,采用“您本人在近一年以来参加过以下哪些志愿服务?”一题进行测量。该题涉及儿童关爱、青少年辅导、老年关怀、妇女维权/保护、扶助残障、支教助教、扶贫济困、医疗护理、法律援助、环境保护、抢险救灾、国际援助和其他(拥军优属、教育助学、心理咨询、大型社会活动等)13类志愿服务活动。如果受访者在调查时点前近一年内参与过其中任意一种志愿服务,视为参与过志愿服务(取值为1),反之则视为没有参与过(取值为0)。本文通过将公民参与过的志愿服务种类数加总,把变量转化为1—13的连续变量来衡量志愿服务参与度。

3. 调节变量

本研究设置了代际调节变量,以验证不同青年代际组对于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共同富裕认知影响的差异。由于本研究将青年人口的年龄范围界定在18—35岁,即出生于1988—2006年间,存在1988和1989两个年份的“80后”,为了方便统计,把这部分群体归入“90后”,最终将青年群体按照当前中国社会普遍认同的十年一代划分为“90后”和“00后”两个代际组来对比分析青年群体的共同富裕认知差异以及志愿服务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在探究青年群体内部共同富裕认知差异的模型分析中,此变量为解释变量;在以青年群体共同富裕认知为因变量、志愿服务参与度为解释变量的模型分析中,此变量为调节变量。

4. 控制变量

本研究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政治面貌、民族、地区、就业状况、家庭年总收入(取对数)、主观幸福感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主观幸福感采用问卷中“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一题进行测量,回答包括“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这些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1。为避免异方差问题,本文进行了稳健标准误回归分析。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比例/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共同富裕知晓度(1=知道)	49.01%		1635
共同富裕关联度	不相关	13.88%	1558
	不太相关	25.48%	
	比较相关	44.67%	
	非常相关	15.97%	
志愿服务参与度	0.83	1.27	1658
世代	“90后”	72.48%	3254
	“00后”	27.52%	

续表：

变量		比例/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性别(1=女)		49.28%		3254
年龄		27.56	5.28	3254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15%		3252
	初中	20.47%		
	高中、中专、职高	21.13%		
	大学及以上	54.25%		
婚姻状况(1=已婚)		47.85%		3254
户籍(1=城镇)		39.20%		3220
政治面貌(1=党员)		9.14%		3254
民族(1=汉族)		89.85%		3251
地区	东部	47.26%		3254
	中部	26.62%		
	西部	26.13%		
就业状况(1=有工作)		58.96%		3254
家庭年总收入(取对数)		11.48	1.06	2992
主观幸福感	很不同意	2.08%		1634
	不太同意	5.94%		
	比较同意	53.49%		
	非常同意	38.49%		

(三) 模型与分析方法

首先，本研究对于不同代际组青年的共同富裕政策知晓度和关联度进行描述性分析，初步探讨青年群体对共同富裕政策的认知水平差异；其次，由于共同富裕认知度和关联度两个因变量分别是二分变量和有序变量，因此利用二元 Logistic 和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构建本研究的模型一和模型二，来分析青年群体内部共同富裕认知的代际差异，从而检验假设 1 和假设 2；接着，通过 T 检验解释青年群体内部的志愿服务参与差异，并结合模型一、模型二进一步分析志愿服务对共同富裕知晓度和关联度的影响机制，从而检验假设 3 和假设 4；最后，在原模型基础上加入代际组与志愿服务的交互项构建模型三和模型四，分析代际变量对志愿服务参与度影响共同富裕认知的调节效应，并基于此检验假设 5 和假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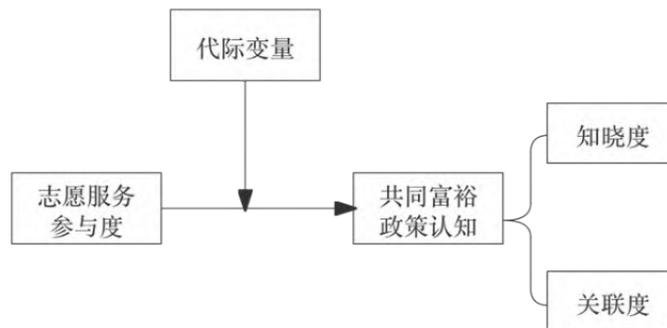


图 1 代际变量的调节效应图

四、结果分析

（一）青年群体的共同富裕认知差异分析

在共同富裕政策的知晓情况中，结果显示（见表2）青年群体对共同富裕政策的知晓比例为49.01%，高于全样本的37.78%，说明青年群体在共同富裕认知方面相对于社会整体具有较高的水平。在青年群体内部分代际来看，“00后”的知晓比例66.40%显著高于“90后”的42.48%，说明“00后”对共同富裕政策持有更高关注度和了解度。在共同富裕与自身生活关联程度方面，青年群体整体的共同富裕关联度均值为2.63，表明更多的人选择了“比较相关”或“非常相关”。在青年群体内部，“00后”的关联度均值2.81高于“90后”的2.55，再次表明“00后”新生代对共同富裕的认知程度更高，认为该政策与自身生活联系更密切。因此，需要把代际作为青年群体共同富裕认知的影响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中作进一步考察。

表2 青年群体内部共同富裕认知情况

	知晓比例	N	关联度均值	N
“90后”	42.48%	1123	2.55	1051
“00后”	66.40%	512	2.81	507
青年群体	49.01%	1635	2.63	1558
全样本	37.78%	6460	2.65	5741

表3报告了青年群体共同富裕政策认知代际差异的回归结果。模型一是代际变量对共同富裕知晓度做logistic回归分析，该模型中的发生比率 $\exp\beta$ 指的是，当自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该组的发生比率是参照组发生比率的 $\exp\beta$ 倍。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情况下，“00后”共同富裕知晓度与“90后”相比，其回归系数为0.49，即发生比率为1.63（ $e^{0.49}=1.63$ ），这意味着“00后”知道共同富裕政策的发生比“90后”高了63%，且达到显著程度。由此可见，“00后”比“90后”的共同富裕知晓度更高，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

模型二是代际变量对共同富裕关联度做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该模型中的发生比率 $\exp\beta$ 指的是，当自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因变量从一个有序类别到下一个有序类别的相对发生比率。从回归模型拟合结果看，“00后”共同富裕关联度与“90后”相比，其回归系数为0.82，即发生比率为2.27（ $e^{0.82}=2.27$ ），这意味着“00后”在共同富裕关联度上表现出更高的倾向或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大约是“90后”的2.27倍，且达到显著程度。由此可见，“00后”认为共同富裕与自身生活关联度更高，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

表3 青年群体共同富裕政策认知的代际差异

	共同富裕知晓度	共同富裕关联度
	模型一	模型二
参照组：“90后”		
“00后”	0.49** (0.24)	0.82*** (0.21)
控制变量		
性别	0.08 (0.13)	0.13 (0.11)

续表：

	共同富裕知晓度	共同富裕关联度
	模型一	模型二
年龄	0.02 (0.02)	0.06** (0.02)
受教育程度	0.90*** (0.08)	0.28*** (0.07)
婚姻状况	-0.66*** (0.17)	-0.19 (0.15)
户籍	0.05 (0.12)	-0.29** (0.10)
政治面貌	0.85*** (0.22)	0.47** (0.20)
民族	-0.15 (0.22)	-0.23 (0.19)
地区	0.06 (0.07)	0.09 (0.06)
就业状况	-0.15 (0.15)	-0.04 (0.13)
家庭年总收入	0.10 (0.06)	-0.07 (0.05)
志愿服务参与度	0.23*** (0.05)	0.19*** (0.04)
主观幸福感	0.13 (0.09)	0.31*** (0.08)
常数	-4.21*** (0.99)	
截点		0.80 (0.86)
		2.33 (0.86)
		4.59 (0.87)
样本量	1489	1425
伪R ²	0.19	0.04

注：(1) 括号内为稳健型标准误；(2) ***p<0.01, **p<0.05, *p<0.1

(二) 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的影响

志愿服务参与情况的统计结果显示（见表4），在志愿服务参与率方面，约42.41%的青年受访者报告自己在过去一年内参与过至少1种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这也意味着在过去一年内未参加过任何类型志愿活动的青年受访者占到57.59%。由此可见，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率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志愿服务参与类型方面，青年群体在环境保护、老年关怀以及儿童关爱方面参与率较高，均超过了10%；青年群体在国际援助、法律援助以及妇女维权/保护方面参与率则较低，均不足2%。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的种类分布并不均衡，这意味着青年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面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表4 青年群体志愿服务的参与情况

志愿服务活动名称	比例	志愿服务活动名称	比例
儿童关爱	13.48%	医疗护理	5.53%
青少年辅导	7.02%	法律援助	0.98%
老年关怀	13.64%	环境保护	16.12%
妇女维权/保护	1.70%	抢险救灾	4.93%
扶助残障	4.94%	国际援助	0.19%
支教助教	2.09%	其他	7.17%
扶贫济困	5.24%	合计	42.41%

为分析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是否存在代际差异，本研究借助t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见表5)，“00后”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均值为0.96，与“90后”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的均值相差0.18，远高于“90后”群体的志愿服务参与度均值，并且这种代际差异通过了统计检验。这意味着，相较于“90后”群体，“00后”群体存在更多的志愿服务参与行为，对社会公益活动具有更强烈的参与意愿。以上分析表明，志愿服务参与度在“00后”与“90后”之间存在代际差异，研究假设3通过检验。

表5 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的代际差异

代际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与“90后”的差异	t-value
“90后”	0.78	1.31	1137		
“00后”	0.96	1.15	521	0.18	2.71***

为分析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的影响，本研究把共同富裕知晓度与关联度两个变量分别作为因变量，以志愿服务参与度为自变量，并将所有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由模型一数据可知，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越高，知晓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就越大，即志愿服务参与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知晓共同富裕的发生比是不知晓共同富裕的1.25倍($\beta=0.23$)。由模型二数据可知，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越高，共同富裕关联度就越大，即志愿服务参与度增加一个单位时，共同富裕关联度的发生比率是原来的1.20倍($\beta=0.19$)。

综上所述，对于青年群体而言，他们的志愿服务参与度越高，对共同富裕政策的知晓度与关联度也越高，研究假设4通过检验。

(三) 代际差异对志愿服务参与度与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关系的调节效用

由表3的分析结果可知，无论是代际差异还是志愿服务参与度，都对青年群体的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产生了显著影响，但两者的交互项如何在提高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中发挥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具体结果见表6。

在模型三中，可以发现代际变量与志愿服务的交互项结果未通过统计检验。也就是说，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其共同富裕知晓度的影响力并不存在“90后”与“00后”的差异。假设5未通过检验。在模型四中，可以发现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共同富裕关联度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代际变量与志愿服务参与度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17，且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代际变量与志愿服务参与度的交互项对共同富裕关联度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6通过检验。但值得注意的是，与“90后”群体相比，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共同富裕关联度的正向促进作用在

“00后”群体中具有相对更弱的表现。即对“00后”群体而言，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共同富裕关联度的促进作用并不如“90后”群体。

表6 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共同富裕观的影响及代际调节

	共同富裕知晓度	共同富裕关联度
	模型三	模型四
参照组：“90后”		
“00后”	0.50 [*] (0.26)	0.98 ^{***} (0.23)
志愿服务参与度	0.23 ^{***} (0.06)	0.23 ^{***} (0.05)
交互项		
代际变量×志愿服务参与度	-0.01 (0.11)	-0.17 ^{**} (0.08)
控制变量		
性别	0.08 (0.13)	0.13 (0.11)
年龄	0.02 (0.02)	0.06 ^{**} (0.02)
受教育程度	0.90 ^{***} (0.08)	0.28 ^{***} (0.07)
婚姻状况	-0.66 ^{***} (0.17)	-0.19 (0.15)
户籍	0.05 (0.12)	-0.23 ^{**} (0.10)
政治面貌	0.84 ^{**} (0.23)	0.45 ^{**} (0.21)
民族	-0.15 (0.22)	-0.21 (0.19)
地区	0.06 (0.07)	0.08 (0.06)
就业状况	-0.15 (0.15)	-0.05 (0.13)
家庭年总收入	0.10 (0.06)	-0.08 (0.05)
主观幸福感	0.13 (0.09)	0.32 ^{***} (0.08)
常数	-4.22 ^{***} (0.99)	
截点		0.82 (0.86)
		2.35 (0.86)
		4.62 (0.87)
样本量	1489	1425
伪R ²	0.19	0.04

注：(1) 括号内为稳健型标准误；(2) ***p<0.01, **p<0.05, *p<0.1

五、总结与启示

（一）总结

基于CSS2023的数据资料，本研究主要分析了三方面内容：第一，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在“90后”与“00后”群体中的差异情况；第二，志愿服务参与度在“90后”与“00后”群体中的差异情况；第三，从志愿服务参与的角度分析青年群体共同富裕知晓度、关联度的影响因素及代际的调节作用。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青年群体对共同富裕政策的整体认知水平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原因可能在于青年群体通常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这使得他们相对其他社会群体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新的政策和理念。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和实践经验，他们的共同富裕政策认知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另外，本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内部共同富裕认知存在代际差异，“00后”比“90后”的共同富裕知晓度更高，同时“00后”认为共同富裕与自身生活的关联度更高，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当前青年群体的代际差异的研究趋势。“00后”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与入世全球化开放的进程成长起来的，一方面，互联网与传媒技术的更新迭代使更年轻的代际群体接收到更多政策性信息；另一方面“00后”长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其思想观念具有深度现代化的特点^[40]，对政治持更积极参与的态度，高度认同国家大政方针的现实价值。

第二，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率和参与面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志愿服务参与度在青年群体中存在代际差异，相较于“90后”，“00后”具有更多的志愿服务行为，拥有更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愿。造成这种代际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相较于“90后”群体，部分“00后”群体仍处于求学阶段，具有更为充裕的时间参与志愿服务；另一方面，当前教育体制关注学生全面发展，部分高校将志愿服务参与情况与学生综合测评相挂钩，从而激发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当然，这两方面的原因解释有待进一步研究予以验证。

第三，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共同富裕政策知晓度、关联度能够产生积极促进作用，说明志愿服务参与是影响青年群体共同富裕认知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志愿精神与公民精神的理论内涵高度一致，由此培养的责任感和公民意识能够促使青年更加关注共同富裕这一国家政策的实施情况；另一方面，作为提升公民精神的重要途径，志愿服务这种直接的实践经验有助于青年更深入地理解共同富裕政策的内涵、目标以及实施效果，从而增强他们对政策的认知。同时，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共同富裕关联度的影响力在青年群体内部存在代际差异。值得注意的是，“00后”群体在志愿服务参与度对共同富裕关联度的正向促进作用上弱于“90后”，这可能受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影响。客观上，“00后”参与的志愿服务存在重形式轻内容的问题，这导致“00后”群体参与志愿服务流于表面，并未深刻意识到志愿服务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同时大部分“00后”群体没有就业，还没有真正投身于经济社会建设当中，因此未能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切合自身联系共同富裕政策。主观上看，“00后”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是模糊的。有关研究表明，志愿者更倾向于形成明确且利己的动机。而伴随社会对新世代具有越来越高的期待和要求，“00后”的社会活动更聚焦于自身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后物质主义倾向。他们能否真正意识到志愿服务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并切实将共同富裕理念融入志愿服务参与动机，有待进一步研究予以检验。

（二）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有两点启示。

其一，青年群体的共同富裕知晓度和关联度呈现的整体水平较高，但其内部存在代际认知差异。基于此研究结果，为了发挥青年群体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本文建议首先应通过学校教育、社会实践活动、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强对青年群体的政策教育，促进青年群体能够全面、深入地理解共同富裕政策，同时关注代际差异，精准施策。对于“90后”，要充分考虑其价值观念的理性、务实、自我、功利化等突出特点。从“90后”这个代际群体的成长经历和社会变迁剖析他们对于共同富裕政策的认知与态度是后续研究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对于“00后”，可以充分利用其高度依赖互联网和传媒技术的特点，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政策宣传；同时积极为青年群体提供实践平台，如组织志愿服务、参与社区治理等，让他们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政策的本质和内涵。

其二，在认知层面，青年群体志愿服务参与度对提升共同富裕政策知晓度、关联度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在实践层面，以青年群体为主力军的志愿服务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为帮助青年知晓共同富裕政策，鼓励青年投身共同富裕建设，应继续推进志愿服务发展，深入构建志愿服务长效机制。构建青年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可从内生机制和外生机制发力，一方面，提高青年群体对志愿服务的认可程度，激发参与志愿服务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社会、高校等主体作用，为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服务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基于横截面数据得到的志愿服务参与对共同富裕认知度、关联度的正向影响，是一个初步且有限的发现，其普遍性和稳健性有待通过面板数据进一步验证。面板数据能够提供时间序列上的动态变化，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捕捉志愿服务参与与共同富裕认知度、关联度之间的长期关系和变化趋势。此外，研究中观察到的“90后”和“00后”在志愿服务参与及共同富裕认知上的差异，可能更多地源于他们所处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而非真正的世代（cohort）特征差异。具体来说，“90后”大多已经离开学校、步入社会，而“00后”则还有相当大比例在校学习，这种不同的生活环境和角色定位可能导致他们在志愿服务行为和对共同富裕的认知上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将这种差异简单归因于世代更替可能过于片面。

不过，囿于当前可用的C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中处于青年阶段的“85后”样本量相对较少，这限制了进行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对比分析的可能性。“85后”作为连接两代青年的桥梁，其经历和态度对于全面理解代际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未来研究希冀能够有更充足、更具代表性的样本数据，特别是增加“85后”群体的样本量，以便更全面地验证和探讨志愿服务参与与共同富裕认知度、关联度的关系，以及不同世代青年之间的差异。这样的研究将为我们提供更深入的理解，促进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优化。

参考文献：

- [1] 何建华. 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公平正义[J]. 伦理学研究, 2023(2):1-6.
- [2] 袁方成, 李会会. “同意的治理”: 理解政策认同的实践逻辑——Y县宅基地改革观察[J]. 探索, 2020(3):142-155.
- [3][4] 赵建建.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志愿服务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3:149,155.
- [5][21] 魏莉莉. 青年群体的代际价值观转变: 基于90后与80后的比较[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10):64-75.
- [6] 李斌雄, 杜泓锐. 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色、价值导向和实践要求[J]. 学习与实践, 2023(3):3-12.
- [7] 卓成霞. 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共同富裕: 历史耦合与实践进路[J]. 求是学刊, 2023(1):22-30.
- [8] 周密, 付应铨, 王威华. 共同富裕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4(3):3-15.
- [9] 左伟. 超越西方现代化: 中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优势[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1):136-146.
- [10][11] 叶子鹏, 郑宜帆. 青年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强国复兴的青春路向[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8):33-42.
- [12] 郑建君. 青年群体政策参与与认知、态度与行为关系研究[J]. 青年研究, 2014(6):20-28+91-92.
- [13] 王雁, 王鸿, 谢晨, 等.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 认知与行为的现状分析与探讨——以浙江10所高校为例的实

- 证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3(5):132-139+105+160.
- [14] SMITH E S .The effects of investments in the social capital of youth on political and civic behavior in young adulthood: a longitudinal analysis[J].Political psychology, 1999(3):553-580.
- [15] 杨文圣,侯应寿.共同富裕的主观向度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22(9):87-95.
- [16] 何绍辉.Z世代青年的形成背景与群体特征[J].中国青年研究,2022(8):14-20.
- [17] 韩丽颖.新生代大学生发展的特征、矛盾与对策[J].社会科学战线,2022(3):215-223.
- [18][41] 李春玲.代际社会学:理解中国新生代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独特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20(11):36-42.
- [19] 陆杰华,郭荣荣.代际社会学视角下新时代青年群体研究[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2):26-34.
- [20] 邓希泉.“90后”新价值观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2016(9):23-30+53.
- [22] 马川.“00后”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实证研究——基于近两万名2018级大一学生的数据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2019(3):95-99.
- [23] 李春玲.社会经济变迁中的Z世代青年:构成、观念与行为[J].中国青年研究,2022(8):21-27.
- [24] 李春玲.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J].社会学研究,2019(3):1-24+242.
- [25] 刘宏森.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青年参与[J].青年探索,2018(1):36-50.
- [26] 李凌.志愿服务对推动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价值[J].中国志愿服务研究,2021(2):12-19.
- [27] 谭建光.中国志愿服务工作体系的发展分析——兼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青年志愿服务的创新[J].青年探索,2024(2):17-25.
- [28] 谭竹希.志愿服务助推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主要机制及实现路径[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4(3):24-30.
- [29] BANDURA A. Handbook of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M].Chicago: Rand McNally Press,1969:213-262.
- [30][31] 魏娜,毛立红.志愿服务:培育公民精神的新典范[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60-63+86.
- [32] 张晓红,马若雁,凌伟强.志愿服务造就新时代好青年:理论根源、基本要求和实践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23(5):133-138.
- [33] 张睿,姚冠华,潘迪.以志愿服务提升大学生现代公民素养的路径研究[J].北京青年研究,2014(4):41-45.
- [34] 池上新,石耀东,黄继朝.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治参与基于世代差异的分析视角[J].社会,2023(5):204-234.
- [35][39] 邹宇春,李建栋.青年爱国主义思想与志愿服务研究[J].青年研究,2021(3):1-15+94.
- [36] 时昱,沈德赛.当代中国青年社会参与现状、问题与路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8(5):38-44.
- [37] 邹宇春,李建栋,王翰飞,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90后青年的个人心态和志愿服务参与[J].青年发展论坛,2020(4):22-29.
- [38] 姚亮,吕东霞.解构与重构:青年对社会稳定的双重影响——近年来关于青年与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综述[J].中国青年研究,2017(8):110-118+28.
- [40] 杨雄.“00后”群体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新特征[J].人民论坛,2021(10):18-22.

责任编辑:李露萍